

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筹办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9月17日—20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沈阳市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日本、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学者近百人，提交会议的论文共80余篇。与会者中有：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刘大年、执行会长白介夫，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有关负责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副会长金冲及、秘书长王庆成，国内著名学者吴大琨、宓汝成、魏宏运、王桧林（大陆），蒋永敬、李恩涵（台湾）和外国学者井上清、齐赫文斯基、唐德刚、吴天威等。抗战将领吕正操、杨成武应邀赴会，并发表了讲话。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名誉会长胡乔木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刘大年在开幕词中对这个主题作了阐明。他指出：研究抗日战争归根结底要解决两个根本性的认识问题，一是“认识中华民族这个近代积弱而又伟大的民族”，二是“认识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与往前往后中国历史的关系”。与会学者对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史的许多问题发表了各自的学术见解，并展开了讨论。现将学术观点与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抗日战争史的宏观研究

这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学者探讨了抗日战争史宏观研究方面的课题。

刘大年论证了抗日战争与中国民族统一的问题。他认为：

“抗日战争以前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是分裂的，不统一的”，至抗日战争才开始实现民族统一，而这“也正是中国民族运动、民族复兴的新起点”。中国民族统一的动力“来自中国阶级关系的大转变，来自中国民族的觉醒”。“中国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统一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立斗争并没有结束”，但“这时的矛盾斗争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意识领域，主要不表现在武装对峙上，中国抗战的阵营能够坚持和运转，这是关键的一环”。国共严重的对立斗争何以没有导致抗日阵营的分裂呢？这是因为：“蒋介石主观上是抗日反共并重，甚至反共重于抗日”。但“他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消极抗日也还是抗日”。在双方矛盾斗争中，共产党很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节”就是不要让抗日战争这个全局遭到危害。他论证说：抗日战争不止同时是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它同时又是争取抗日胜利以后中国民族统一前途的严重斗争。民族解放，民主改革，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民族统一，它们结合在同一过程里，“三位一体”。不同势力之间的斗争显得格外激烈复杂，引起社会关系政治力量之间的变动格外显著。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全局，就是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所在。

胡绳论证了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他指出：“对中国的民族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国广大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阶层中间的民族凝聚力。”“这种民族凝聚力产生于中国的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由于这种民族凝聚力，“团结起来的中国广大人民成为侵略者所摧毁不了的铜墙铁壁，成为侵略者只能淹死在其中的海洋”。

王桧林论证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总格局是：一场战争——全国一致进行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伪政权。有的学者对“三种政权”说提出商榷，认为抗日战争

时期中国只存在两个政权（重庆、延安），日本占领区的伪政府是受日本支配的，并不能行使主权，它是日本政权的延伸。

杨成武、罗焕章、张宏志论证了中国抗日战争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他们认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虽得到苏美英等国的一定援助，但中国也给了对方相当的援助。中国抗战为苏美英等国提供了屏障和掩护，争取了战备的宝贵时间，并对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起了重要的战略支援和配合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抗战历时最长，中国人民牺牲最大，中国对日本国力的消耗和日本军力的消灭最多。中国人民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

二、关于九一八事变研究

九一八事变是这次学术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许多学者就九一八事变的背景、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和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以及这次事变的意义作了广泛的探讨。

1. 日本侵华政策和九一八事变的策动

美国朱永德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包括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中武士传统的影响和日本与德、俄、美、中等国关系中的刺激因素。沈予论述说：日本侵华政策自华盛顿会议后，出现过“币原外交”、“田中外交”，不断变换手法，但其重点却是加强对“满蒙”扩张这一基本脉络，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其推行“大陆政策”，策划“满蒙独立”一连串阴谋活动发展的必然产物。蒋立峰认为，日本对外军事扩张战略中的“南进”与“北进”之争，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重视侵占中国东北乃至长城以南地区。其“北进”意向所指虽为苏联，实际侵略矛头却是对准中国东北，它要“南进”，首先也是向中国长城以南进而向长江以南扩大侵略，才能打开通道，南进西南太平洋地区。张振鹏指出：在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方针已定的情况下，有了九一八，就必然会有七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九一八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二八，七七之后不久发生了八一三，每一次都是日本在北方制造事

变，紧接着在南方的上海挑起衅端，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侵华战争有一个北起南应的规律，在策略战略上配合，深化侵略。

一些学者对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关东军作了探析。王秉忠分析了“满铁”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全境和制造伪满洲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肖炳龙研究了“满铁”在伪满时期以特殊会社制度实施经济统制的情况，说它通过将伪满经济各部门中具有垄断性经营的特殊企业变为自己的关系会社，全面控制了伪满的经济。李良志、廖良初论述了关东军建立和覆亡的过程和它的各种侵略罪行。张志强介绍了日本关东宪兵队作为关东军的帮凶，配合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中的一系列阴谋活动。

在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中，石原莞尔和本庄繁是关键性人物。日本水野明论述了石原提出日本“领有满蒙”主张，制订“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长期为发动侵占东北作准备的过程，认为“石原莞尔是九一八事变的元凶”。针对有人认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先不知道发起柳条湖事件的阴谋，九一八事变中他没有责任的观点，高培论述了本庄在策划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炮制伪满洲国的过程中，动员组织，布置指挥，起了关键作用，认为他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

胡春惠对万宝山事件与韩侨问题作分析，揭露了日本无时不以东北韩侨问题做题目，一方面大量移入韩民作为其开发东北的先导力量，一方面借口保护日韩侨民强行在延边设领设警，增派军队，处心积虑把韩侨作为侵略工具。移居东北的韩人，在中国人眼中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扩展下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但也是朝鲜本土排华运动的火种来源。朝鲜朴仁根赞同胡春惠在万宝山事件问题上对日本帝国主义挑拨中朝民族关系的分析。他说，过去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挑拨离间中朝两国民族的关系，削弱两国人民的力量，并从中制造借口，发动全面侵略。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离间政策，要记取历史教训，提高警惕。

日本西村成雄分析说，东北张学良政权三年中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相呼应，这种“从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化”（国家资本主义主导型），被日本视为“一种障碍”，九一八事变从经济性质上看，可以理解为日本不容许东北地区从上而下的资产阶级化，而采取的行动。

2. 中国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是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最为引起关注的论题，许多学者就此发表见解，并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1)对不抵抗政策的理解和评价。蒋永敬认为，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要作全面分析。抵抗固然表现在军事方面，但亦表现于其他方面，如“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在东北修铁路，修港口，与中央合作，不也是抵御日本侵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诉诸国联”的外交行动，对日本施加了外交压力。经济上抵抗作用不下于军事方面，外交上的努力也是抵抗。再说，蒋介石九一八事变时没有抵抗，后来一二八事变时还是抵抗了。到1935年条件成熟了，他就下定了抗战决心。抵抗与否要从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不抵抗也不一定就是卖国。吴天威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蒋张二人均能尽忠职守，其决策无不以国家利益为前提。金冲及认为，固然不能笼统地说，抵抗就是爱国，不抵抗就是卖国，但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实行不抵抗就是错误的。李云峰等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中日双方在东北的兵力相比，中方远多于日方，如果抵抗，中国不是注定失败的。蒋介石之不抵抗，不是实力不足，而是他把主要力量用于剿共前线。高存信认为，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宁予友邦，不予家奴”。

(2)蒋介石、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应负之责任。大陆过去不少著述都记载说，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会上一些发言仍持此说。高存信、马洪武认为，张学良力主抗日，蒋介石坚持“安内攘外”，九一八事变时即已产生分歧；

张学良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根源在于蒋介石，蒋介石是不抵抗政策的制定者。李云峰认为，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并非始于九一八事变”，“早在1928年5月济案时就已初步确定，并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有些学者不同意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说法，认为现在没有确实的史料证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有些回忆也难以凭信。俞辛焞辨析了过去用以阐述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证据，均为蒋处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方针，而不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的命令。他分析蒋张二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表现后得出结论是：张学良与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基本态度是大体相同的，张学良是自觉自主地奉行不抵抗政策。张虽然是蒋的副司令，但他作为奉系军阀的后代，尚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抵御蒋的实力和脾性，如张不同意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为了保自己的东北地盘，他可以不听蒋的命令奋起抵抗的，事实并非这样。在后来防守锦州的问题上，蒋和南京数次令他抵抗，他却悄悄撤兵就是一个证明。吴天威也认为，九一八事变时对日军进攻不抵抗，出自蒋张二人的共识。从蒋与张二人的关系看，也不存在蒋对张下命令的问题。当时蒋张合作无间，蒋与张之间以兄弟相称，有什么指示也是很客气地商量，不象是下命令，张服从蒋也不是被迫式地执行。当时张学良能调动的东北军兵力比蒋介石能调动的兵力还要多，蒋介石有什么命令张学良如不同意也可以不执行。但金冲及等认为，虽然张学良不抵抗有其自身的问题，但蒋张之间毕竟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蒋对不抵抗负有更主要的责任。

(3)蒋、张实行不抵抗的原因。李云峰认为，蒋介石实行不抵抗的政策源于其弱国意识和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不相信人民御侮能力，并怕为共产党所利用，对日本侵略意图缺乏认识，对国联过分迷信；他把“扑灭赤匪”看作压倒一切的任务。俞辛焞着重分析了蒋、张二人不抵抗的认识根源：他们在事变之初未能判断出这是日本侵吞整个东北的开始，以为这是日军挑衅行为，是局部

的军事行动，图谋以外交交涉解决；继而又寄希望于反对扩大军事行动的币原外相及其外交，想靠日本政府控制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待至判断出日本是要占领东北三省的目的后，他们主观上虽想抵抗，但无实际行动，因为国内不统一，二人主张先要“安内”，并怕在抗日中拼掉自己实力，同时也有“恐日病”作祟的原因。吴天威、蒋永敬则强调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客观历史环境。吴天威论及当时国内不统一，1931年全国发生百年未遇之水灾。蒋永敬认为，全国不统一怎能对外？当时宁粤对立，“安内攘外”也不只是针对中共，主要是对西南的。金冲及、王维礼认为，从原则上说，只有全国统一，才能一致对外。但问题是怎样才能统一？是采用武力手段消灭异己势力来求得统一呢，还是采取抗日方针实现全国统一？后来事实证明，全国抗日战争发动后，国内各派力量正是在抗日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3. 诉诸国联和国联调处

过去许多著述对蒋介石、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军事上不抵抗，而诉诸国联，均持批判态度。这次会上学者们肯定了诉诸国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俞辛焞认为，蒋、张对国联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作为战时外交，可谓都尽了最大努力，并达到了有利于中国的部分目的。不过他们不是以军事上的抵抗来支撑这一外交，外交显得软弱妥协。诉诸国联行动本身并无不对，但是“因不抵抗便增加依赖国联，甚至把诉诸国联当成解决促使日军撤退的唯一手段”。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并论及蒋介石和张学良在实施国联外交过程中主张的相异处。如防守锦州时，蒋介石欲求得国际担保阻挡日本的进攻，反对与日本直接谈判，而张学良却曾主张接受日本直接谈判的要求。

蒋永敬对顾维钧诉诸国联作了充分肯定，说顾氏坚持“满洲问题，非仅中国之问题，乃一国际之问题”的观点，在日占满洲，中国无实力单独对抗的情势下，依赖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与日本周旋，将事件国际化；认为他在国际上的努力，长期造成对日不利的影

响。

有关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调处，近些年来也逐步改变了过去完全加以否定的看法，史学界的评价趋向全面客观。刘建武的论文反映了这种情况。他认为：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变的调处，在一定程度上向全世界披露了日军的侵华真相，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使日本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最后不得不退出国联。但它在调处过程中“从维护英法美等大国利益出发”，“其总的表现是软弱拖延，徘徊观望”。

三、关于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外关系研究

李恩涵论述了王正廷“锲而不舍”地“坚持撤废不平等条约”，“尤其着重致力于撤废各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的“革命外交”取得的进展的情况。说当王正廷与英美谈判取得进展时，日本却不退让。及至九一八事变发生，中美谈判中断，中英草签的新约也夭折了。

步平分析美苏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认为：美国与日本在东北亚长期处于对立地位，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它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从“不干涉”转而“不承认”的基本原因。苏联承袭了俄国在东北的利益，需要继续与日本维持缓和，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它支持中国却又有相当保留的原因。两国外交的出发点并未完全遵循它们所分别宣称的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而是强调本国利益，“以中小国家的利益作交换的筹码”。

苏联齐赫文斯基、札哈洛娃和罗班诺夫，均强调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罗班诺夫说：“苏联政府尽管由于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外交关系处于中断的状态，但对中国仍采取同情的立场。在中日有关满洲的交涉中，苏方总是考虑到中方的利益。”札哈洛娃论及，苏联在国联开展了积极的活动，组织对中国的国际援助。他们二人均论述到苏联允准东北抗日武装苏炳文部在苏联逗留，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引渡苏炳文部要求的情况。齐赫文斯基论及，苏联政府和舆论“坚决谴责日本占领军在

中国东北的侵略行为”。他认为，“如果南京的蒋介石政府不对日本帝国主义节节退让，停止实行反共反苏政策，团结国内一切爱国力量”，“日本是不敢占领中国东北和实行后来在上海的军事行动的”。他甚至说：如果中苏关系不恶化，就不会出现九一八事变。陶文钊、李嘉谷、步平等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认为，中苏关系恶化对日本侵华有一定的关系，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无疑利用了这样的条件。但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那是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一贯侵华政策的必然产物，它是不以中苏关系状况为转移的。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政策有两面性，它同情中国人民，谴责日本发动事变，但它又执行了严格的“中立”、“不干涉”政策，后来，当着中东铁路实际上难以经营时，甚至与伪满当局谈判，把中东路卖给了伪满，这就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承认，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表现了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

李嘉谷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关系的调整。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苏面对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威胁，逐步调整了相互关系；恢复了正常外交，但商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事情被拖延了，直至七七事变发生后互不侵犯条约才正式缔结。苏联给了中国及时有效的援助，支援了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抗战也确保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关系的调整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四、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地区和华东、华北地区陆续发生过多起抗日战事。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不少学者论及这一时期局部抗战的问题。余子道全面阐述了局部抗战经历的几个阶段和曲折历程，论证了它的特点和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局部抗战是特殊形态的民族自卫战争”，“无论在地域上或是在参战成份上，都带有局部性的特点”。中国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和我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局部抗战各役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推动了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的历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进行英勇顽强的抗日武装斗争，绵延达14年之久，它是英勇悲壮的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殿鹏、谭译、温永录、罗占元、孙凤云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历程。他们强调东北人民最早展开了抗日武装斗争，认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从1933年春开始失利受挫，出现了暂时低潮，但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并没有停止。温永录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环境之困苦，斗争之残酷，时间之长，在战争史上是少见的。孙凤云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在14年中，中共选派许多优秀干部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在各地抗日义勇军失败后，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中坚和主力。谭译提出了“‘九一八’抗战”的概念，他说：“‘九一八’抗战，是指发生在‘九一八’时期（1931.9—1933.3）的抗战”。他认为，“‘九一八’抗战”与全国抗战一样，也有正面战场（列次保卫战）和敌后战场（游击战争）之分。但有的学者认为，东北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其事迹可歌可泣，但日本帝国主义疯狂镇压后，东北抗战力量到底还有多大，值得研究。

李茂杰、王维礼从重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历史地位出发，论证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他们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同时发生并同步进行的。”九一八事变“使中日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一些学者赞同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开端的说法。但也有些学者不赞成此说，认为探讨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不能局限于看某一个地区，而应全面地看，七七事变才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余子道从分析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的区别出发，也不同意九一八事变是全国抗战开端之说。他认为，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前的局部抗战“在抗日战争史上居于

序战的地位，还不能说那时已存在全国性的抗战了”。有关一直存在争论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问题，王桧林认为，从抗日战争专史的角度，九一八事变是开端，从通史的角度看，七七卢沟桥事变起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他主张抗战起点问题“九一八”、“七七”两说可以并存。

孔令波等对局部抗战中江桥抗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三次著名战役作了论述。马仲廉论述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坚持一个多月抗战，但因国民党当局的阻挠破坏，战役以十九路军撤退而告终。金再及认为，南京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除了妥协一面外，还有抵抗的一面；笼统地说十九路军抗战是违抗了南京政府命令的结果，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不过南京政府对日军意图作了错误判断，它抵抗的目的在于妥协求和。金以林论述说，长城抗战中，南京政府的动机是为了求得国联的调停，稳住全国不断高涨的抗日情绪，故不得不适当抵抗。但它仍坚持剿共，不能倾全力抗日，因此要对日交涉。

五、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研究

新近出版的《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抗日运动史》的主编温济泽，把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武装抗日斗争和群众抗日运动联结在一起，作了简要论述。他认为这一时期抗日运动虽然遭受挫折，但它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不抵抗主义的本质，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美国唐纳德·A·周丹把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学生爱国抗日救亡运动，说成似乎是起了消极作用，说这是“学生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的焦躁反应，显示了他们对日本侵略的震惊”。他们提出种种政治要求，被党派利用，“成了南京国民党与广州国民党之间，南京政府与共产党之间三角内战中的武器”。在国家需要团结统一，并树立政府威信的时候，反倒破坏了团结统一，使政府丧失威信。王庆成、温济泽等不同意周丹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危亡，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是

完全正当的。在学生运动背后是有党派活动，但不能把学生运动说成是被党派利用的工具。自发的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促使南京政府从不抵抗转向逐步抵抗，有促进国家团结统一的作用。蒋永敬同意学生救亡运动合理观点，他认为，当时不论有无党派活动，学生运动都会发生的，出现一些过激现象也不足为奇，关键是政府要理解学生的爱国感情，而不使问题激化。

杨奎松论述了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的救亡主张的异同与变化，认为当时救亡主张的核心问题是抗日，一是统一；分歧的关键在于如何抗日，如何统一。但不论最初在抗日统一问题上存有多少分歧，在日本无休止压迫和进攻面前，全国知识界终于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团结一心，投身于抗日战争了。

自竟凡介绍了东北抗日救亡进步人士高崇民有关九一八事变的一些文章的观点，阐述了高崇民的抗日救亡思想。

胡适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拥护不抵抗，认为当时中国没有对日作战的能力，屡次主张对日“直接交涉”，但在七七事变后，逐步改变了态度，成为奔走抗日的外交使节。耿云志专门论述了胡适对日态度的变化，分析了胡适放弃主和主张的原因，在于：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蒋介石政权的脆弱，无力担起议和的责任，国际上又无支持和平的确实保障；他主观上也是憎恨日本侵略者的。

六、关于华北事变的研究

有些学者对华北事变及“何梅协定”等问题作了探讨。佟冬、解学诗论证了华北事变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他们认为，华北事变始于天津事变，它“是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吞华北而制造的一系列事件的总称”，它“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继续，关东军是事变的主谋，东北沦陷区为事变的策源地”。“广义言之，华北事变还应该包括察蒙事件”。但有些学者仍将华北事变限指为1935年日本一系列侵犯华北的事件及策划分离华北的活动。有的学者提出：华北事变主谋是否应为日本军部，策源地应在日本。

齐福霖论述了日本“三大中国通”板垣征四郎、多田骏、土肥原贤二，从1933年2月板垣奉命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直到1935年11月土肥原策动殷汝耕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三年中，策划华北分治的阴谋活动，进而揭露分离华北是日本军部和日本内阁的既定政策。

熊宗仁论述了从《塘沽协定》到“何梅协定”的历史演变情况，认为：“所谓‘何梅协定’，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口头交涉谈判，以非正式协定的文字作凭，事实上存在并已全部兑现了的卖国条约”。目前史著中“签订”了《何梅协定》的提法，不尽符合史实。

七、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及内部分化的研究

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国民政府从“安内攘外”到联共抗日的政策转变，是研究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内政外交的中心问题。陈先初对此作了探析。他认为，“安内攘外”具有双重特性，在具体执行中，必然以剿共作为前提和核心，但在对日方面不能完全无所作为。从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日起，在重点安内的同时，就已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华北事变后，准备抗日成为国民党工作的重心，“安内攘外”迅速向“联共抗日”方向转变。这一变化是国民党主动所作策略性的调整，“蒋介石等人所具有的抗日民族情绪在其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不能将‘安内攘外’同投降、卖国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安内攘外’与‘联共抗日’截然割裂开来”。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党从妥协退让到决心抗日的政策转变过程中，其转折点是什么，在抗战史研究中有不同看法。杨树标、尹铁认为，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是国民党对日政策转变的标志。袁武振则认为，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国民党政策的重心即已逐渐转向抗日，抗日准备工作也随之开始。他具体论述几个方面的抗战准备：政治方面，1935

年秋冬开始与共产党秘密接触，拉开两党合作序幕；经济方面，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建设国防工业，加强公路、铁路建设，统一财政，改革币制；军事方面，加强国防建设，整编全国陆军，扩建空军、海军，构筑国防工事，整理江防海防要塞，确定战略大后方等。有的学者认为，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改善调整中苏关系也是为抗日作准备，不容忽视。

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变化，伴随着发生国民政府内部的斗争和分化。陈瑞云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分化与改组。她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内部在原有的派系斗争中又加入了对日政策争议的内容，反蒋反汪者打起了抗日旗号；新产生的矛盾往往因对日问题的政见不同而发生分化分裂；矛盾斗争的总趋向是主战者阵营日益壮大。吴景平把宋子文视为九一八事变后拒日派强硬派的代表，说他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期间已有对日强硬表现，从一二八事变至热河抗战期间，则已成为国民党对日强硬派的代表人物，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对日主张发生重大分歧。他认为，这表明日本侵华“在相当程度上危及国民党中央当局的统治，特别是给中国英美派资产阶级的利益带来了重大威胁”。有的学者认为，宋子文一二八事变时主张局部解决，这与评论他为强硬派人物是矛盾的。徐辉琪论述了李烈钧在九一八事变后为着吸引和动员全国民众“共赴国难”而主张和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李氏要求“开放政权”，与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保障民主权利的救亡热潮相适应；但李坚持反共，拒不承认共产党的政党地位，表现出他的“开放政权”主张有深深的阶级烙印。

杨天石运用新发现的胡汉民的大量文电档案资料，揭露了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曾秘密组织“新国民党”，揭起抗日旗帜，联络各地实力派多次准备以武力推翻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权。胡先后与之联络者有张学良、陈济棠、蔡廷锴、李宗仁、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孙殿英、杨虎城等人。

八、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统区研究

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研究的论文不多，但触及一些过去甚少研究的课题。

加拿大徐乃力专门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兵员的补充与士兵素质的变化。他论及：抗战时期由于与日军作战伤亡率、危险性均高，国家经济恶化，士兵待遇大不如前。到了1938年后几乎无人应募当兵，迫使政府用抽壮丁来征集新兵。由于征兵方法不健全，产生很多流弊。士兵生活大不如前，军纪败坏，鱼肉人民。国军的败行是造成民心向背的很主要的因素之一。

关志钢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新生活运动与抗战前不同：强调了为抗战服务；蒋介石对“礼义廉耻”作了符合抗战需要的解释；各项工作围绕抗战展开。其主要贡献为：开展节约献金运动，为前线官兵提供各种战时服务，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但其消极面是，积极配合蒋介石集团发起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进行反共宣传。金再及提出：对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是否可以划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分别评价。她对武汉失守后新生活运动是否仍起积极作用表示怀疑。

日本石岛纪之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社会的变化，包括城市人口的变迁及成分的变化，城市规模扩大和交通发达及新发生的城市问题，农业生产，城市扩大与商品农业的关系等，特别分析了城乡民众状况，诸如工人的劳动、工资、生活水平，商人、知识分子、军人的收入、生活程度，农民阶级的分化等。

九、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

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有少数学者论及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问题。

魏宏运文全面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情况，涉及战地动员委员会、游击战、二五减租、人民负担、百团大战、皖南事变、商业贸易、银行和货币等研究情况。

谢忠厚的论文通过分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得出

这样的结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是理解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问题的关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发展壮大，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革命的旗帜，而且（因为）正确地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急迫的民主民生问题。”

居之芬的论文介绍了一些外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五次考察情况。

十、关于沦陷区和侵华日军的暴行罪行研究

这次学术会议有的论文对沦陷区的探讨涉及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殖民统治的手法方面。杨圣清论述了日本的“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前者的手法如组织傀儡政权，组编伪军，设立各种会所进行奴化教育等，后者是经济掠夺，除直接掠夺公私财物、征税外，还滥发纸币，套购外汇，独占产业榨取资源，统制物资垄断贸易。王希亮论述了日本在东北实施殖民主义思想统治的情况：宣扬“王道政治”、“皇道主义”，愚弄奴化东北人民，并鼓吹“东北自古非中国”、“汉民族非东北民族”等谬论等。曾业英论述了日伪“新民会”的活动。他以汪伪政权成立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标志，划分新民会的发展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剿共灭党（国民党）”为纲领；第二阶段与侵华日军宣抚班“统合为一”，纲领中将“剿共灭党”改为“实行反共”；第三阶段开展“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鼓吹“团结东亚民族”，“建设世界新秩序”。他指出，这个所谓民众团体，是日本侵略者的御用团体，与其说它是“中华民国新民会”，不如说是“大日本新民会”。

有几位学者论及侵华日军的暴行罪行。孙宅巍专门论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遇害同胞人数在30万以上。他从日军十次集体屠杀和几次较大规模的分散屠杀的史实、被掩埋处理的尸体数和南京人口数几个方面，证明被害人数在30万以上是确凿无疑的，批驳了日本极少数人在被屠杀人数上做文章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谬论。王明哲、郭成周、廖应昌、杜凤荷、辛培林等，论述

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实行细菌战、毒气战的情况。日军在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武器研制、生产，甚至做活人试验、活人解剖，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辛培林指出，日本的细菌战活动，天皇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建立、扩充和重大行动均与他有关，甚至是由他亲自决定的。

宓汝成、王礼琦论述了日军侵占海南岛的谋略，日本把侵占海南岛作为建立大东亚帝国的重要一着，想把海南岛和台湾及其占夺的太平洋上的岛屿合在一起，拟名为“南方飞地”，实施直接的殖民统治。它设立了“海南厅”，对海南岛人民残酷杀害，并进行经济掠夺。

此外，香港王玉棠论述到日军轰炸西江及1944年入侵西江后人民遭殃的情况。

朱玉湘、刘培平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后关内向东北地区移民的特点：数量呈下降趋势，流动性强，强制性强，认为“这个时期的移民主要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对东北的经济发展没起多大作用”。

十一、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

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些论文对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作了探讨。

陶文钊论及太平洋战争中中国战场在盟国战略构想中的地位前后的变化。在1942—1943年战略构想中，中国既是对日本进行轰炸的基地，又是最后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随着战局形势的变化，盟国设想主要从太平洋进攻日本，中国战场地位下降，这一点在缅甸战役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

陈谦平论述了1942年蒋介石的访印活动，认为蒋氏访印，试图调解英印矛盾，是有积极意义的，虽然由于英国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这次未能缓和英印矛盾，但在中英军事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张注洪论述了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国际、苏联、亚洲各被压

迫民族和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

胡德坤的论文专门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对日德关系的影响，使日德两盟国之间不能互相配合互相支援，而始终是各行其是，各自为战，从一个侧面加速了法西斯集团的崩溃。

十二、关于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

提交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一些论文通过对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史研究，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1.牢记日本侵略战争的沉痛历史，防止过去灾难重演。胡乔木说，日本从九一八起开始了14年的侵略战争，中国和亚太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都为此而作出了极为沉重的牺牲。日本人民如能正确认识过去不幸的历史，“促进日本今后坚持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使过去的灾难永不重演”，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有“坚实的基础”。“但是这条道路是要经过艰苦努力的”，因为，“日本今天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积极重建军事政治霸权的势力还相当强大，他们竭力隐瞒歪曲和篡改过去的侵略历史”。朱永德在论证日本军国主义发展扩张的历史后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带来的后果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几乎完全被摧毁”；自1946年颁布战后宪法以来，“日本人民享有有史以来空前的繁荣”。前后两种政策，哪种政策的选择最有利于人民呢？日本修改教科书，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等活动深使邻国感到不安。他在文末以沉重的语气向日本提出：“请注意历史的教训！”日本井上清强调：“我们一定要把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两国人民，告诉两国的子孙后代。”

2.只有团结统一才能振兴中华。吕正操说：“历史经验证明，国家统一，中华振兴，就能有效地抵制外敌侵略。中华民族，合则兴盛强大，分则贻害同胞。”愿全国人民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胡绳在论证中华民族凝聚力后指出，“台湾海峡两岸的人为造成的分裂必将消除，实现祖国的大统一”，只有那些“台独”分子不能认识中国人民的强大的凝聚力。但是，

既然过去帝国主义分裂瓜分中国的梦想没有实现，今天要想分裂中国，更加是梦想了。

3. 振兴民族，改变落后面貌。香港杜学魁论文说，九一八事变时向国联告状无用，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继续侵略，这证实了一个真理：弱国无外交。陈崇桥说：“历史昭示我们，分裂和落后就要挨打。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侵华战争，就是因为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而且长期处于四分五裂和内战之中。”金宇钟、常新礼说：“为了摆脱被侵略被奴役的地位，必须团结一致振兴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我们的经济，壮大我们的国力。”

学术讨论会期间，与会学者参观了事变发生地柳条湖新建成的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和张学良将军旧居。

与会国内外学者对这次以“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取得的成功有较高的评价。他们认为，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在大陆学者之间，在中国海峡两岸学者之间，在中外学者之间相互交流了研究成果，增进了了解，这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和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扩大无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京中)